

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

□ 邓 强 段刘妍

不足、劳动力短缺等问题逐渐显现。帮工组、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、劳动互助社等互助合作组织的成立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、耕畜不足的问题。四是推广先进种植技术，解决农业科技水平不高的问题。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，多种早谷、少种糯米，发布消灭“禾虫”的指导办法，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，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。通过开展春耕、夏耕运动，改善种植技术，尽量做到“三犁三耙”，精耕细作，提高产量。适当增加杂粮种植，作为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。

形成系统完备的粮食流通管理体系。中央苏区地处山地丘陵，运输工具落后，交通非常不便，粮食流通不畅。为解决粮食流通问题，苏区党和政府创新粮食工作方法，颁布粮食合作社条例，建立粮食调剂局、粮食部、谷仓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组织，有效调剂粮食余缺。

一是创办粮食合作社。早在1930年5月，闽西苏维埃政府就开始了粮食合作社的探索。粮食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是调节粮食价格，减少剪刀差现象。农民自愿加入者即为社员，实行自主管理，政府不加干涉。所得红利按一定比例分配，同时免缴所得税。比如，在粮食收获季节，合作社以比市价略高的价格，向入社社员收买粮食，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，以低于市价卖给入社社员。粮食合作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、发展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8月，先后颁布文件规定，倡导成立粮食合作社。据统计，到1934年2月，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2个，拥有股金242097元，入股社员243904人。

二是建立粮食调剂体系。1933年春，中央苏区部分地区发生粮荒，一时米价飞涨，粮食调剂局应运而生。同年3月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《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》命令，详细分析了阻碍粮食流通的原因，决定成立粮食调剂局。各地粮食调剂局很快建立起来，至1934年3月，中央苏区各省、县、区和重要圩场均建立粮食调剂局，形成了完备的组织体系，全面负责苏区粮食筹集、存贮、运输以及粮食分配等工作。

三是成立粮食管理机构。1933年底，为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统筹管理，苏区中央决定成立粮食部，调剂局随之划归粮食部领导。1934年1月，粮食人民委员会成立，陈潭秋为首任部长。随后，各省、县、区逐级成立了粮食部，主要职能是进行粮食调查、收集、贮藏、运输及调节粮价等。粮食部成为苏区粮食工作的统筹管理部门，增强了红军及群众的粮食管理保障能力。

四是建立粮食储备体系。粮食合作社与粮食调剂局成立后，各地开始建造、修理谷仓，储备粮食，并设立运输站，有计划地组织粮食运输。1933年5月，中央国民经济部成立谷仓管理委员会，负责收发、保存谷子，并详细规定谷仓管理的人员组成、具体管理办法，粮食储备体系初见雏形，提升了粮食流通效率，减少了粮食损耗，在稳定粮市、备战备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精神，严禁贪污浪费粮食。一是自觉节约粮食。苏区干部、红军、群众同甘共苦，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精神，自觉节约粮食，保证军队供应。

二是大力开展借谷运动、节省运动、集粮运动。1933年春至1934年秋，中央苏区先后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借谷运动，向苏区群众借谷达100万担，很多群众卖粮不要钱、借谷不要还，主动退回政府发给的购粮款和借谷票，有力保障了红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。

三是杜绝多吃多占、铺张浪费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。中央苏区开展了多次声势浩大、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。1933年12月，苏区中央颁发了第一部反腐败法令《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》，明文规定了贪污浪费的刑期定罪标准，其中对贪污、倒卖粮食的犯罪分子惩罚尤为严厉。一名红军干部因倒卖了两担军粮，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，极大震慑了贪污浪费分子。

被毛泽东称为“坚决革命的同志”

——赵博生同志纪念碑碑文敬读

□ 苏春生 刘俊林 杨 鹏

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，一块厚重的青石碑刻格外引人注目。它是国家一级文物，高70厘米，宽84厘米、厚8厘米。碑刻右侧赫然竖刻“纪念赵博生同志”七个大字，碑文为竖写阴刻，计33行，共601个字。当年，这块碑刻镶嵌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的“博生堡”内，堡名由朱德亲笔题写，嵌于堡首。红军长征后，博生堡被国民党军拆毁，这块“纪念赵博生同志”的碑刻被当地群众秘密抬回了家，反盖在鸡窝上得以保存下来。1953年，这块碑刻被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筹备处。碑刻保存完整，除个别字迹剥落外，其余字迹清楚。其碑文如下（括号内容为引者所加）：

赵博生同志是宁都暴动的领袖，是坚决领导转变和创造红五军团为铁军主要负责同志之一。宁都暴动一周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令加奖，并表扬以荣誉的红旗奖章。远在中国大革命时代博生同志，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，故他虽历任白军中旅参谋长及旅长等高级军职，但异常刻苦自励不存一钱，痛恨国民党的背叛革命（，）决心为工农解放，常有人说，我每天都准备死，虽在未死时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一天。一九三零年冯阎蒋军阀混战后，他在陕西率特务旅之一部欲南入汴（汴）中谋革命出路，结果失败，以后曾二次找共产党接头。一九三一年七月遂在宜黄加入共产党（，）勇敢坚决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（，）领导廿六路军士兵两万人举行了伟大光荣的宁都暴动，竖起了辉煌的苏维埃红旗。红五军团成立后，博生同志历任五军团十四军（，）十三军军长，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。一九三三年八月我（红）一方面军与敌主力决战于金溪南城之间，（击）溃敌廿九、九十（，）十四各师，消灭及半数，红五军团在左翼吸引钳制三倍于我之敌（，）于张员庙博生同志亲临前敌肉搏冲锋，自七时至十六时战局将终，与敌相距只百余米远，（子）弹中博生同志右额不出，遂作了伟大胜利中壮烈的牺牲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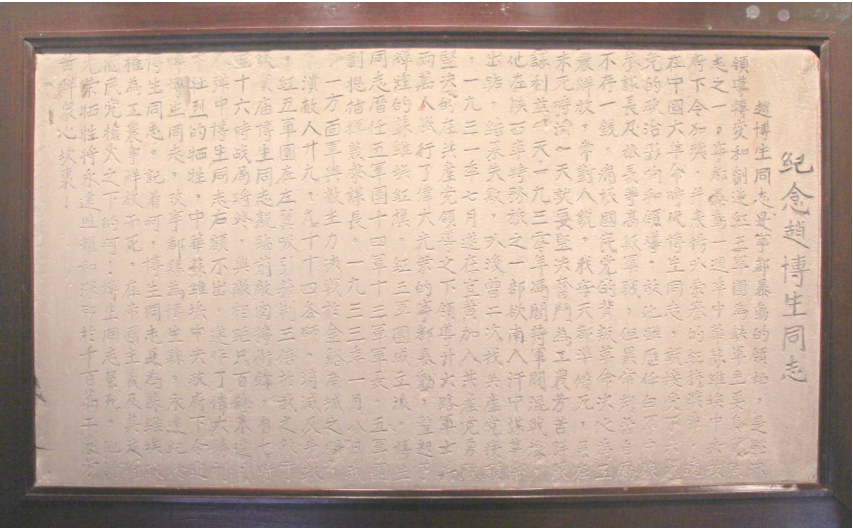
下令追悼博生同志，改宁都县为博生县，永远纪念博生同志。记着呵，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争解放而死，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枪火之下的呵！博生同志虽死，他的光荣牺牲将永远照耀和深印于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心坎里！

碑文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拟写，讲述了赵博生矢志革命寻求光明，于西北军期间秘密入党并发起宁都起义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率部奋战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，读来深受感动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宁都起义擎赤旗

赵博生，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（今属黄骅市）一个农民家庭。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，先后在皖系、直系、奉系军队中任职。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，任旅参谋长、特种兵旅旅长、军参谋长，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。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，倾向革命。他曾创作《革命精神歌》在部队教唱：“先锋！先锋！热血沸腾，先烈为平等牺牲，作人类解放救星。侧耳远听，宇宙充满饥饿声，警醒先锋，个人自由全牺牲。我死国生，我死犹荣，身虽死精神长生，成功成仁，实现大同。”

1931年春，由赵博生担任参谋长的国民党第26路军被派往江西“围剿”红军，但早在这之前，他就曾离心腹张志诚去往上海联系共产党，可是直到部队抵达江西，仍未联系上。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第26路军官兵爱国热情高涨，集体要求：调第26路军回北方，我们要去打日本人！可蒋介石以“攘外必先安内”予以驳回。将士报国无门，还要同胞自相残杀，赵博生不愿无视国耻，不愿干手足相残的事。就在这时，潜伏在第26路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，察觉到了赵博生的政治动向后给赵博生写信，邀请他一同革命，赵博生没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组织就在身边。他表示：我要加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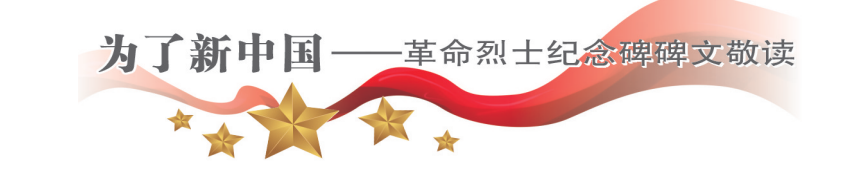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共产党，叫我干什么，就干什么，即使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同年10月，经中共中央批准，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1931年12月14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，赵博生和董振堂、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。当天晚上，赵博生在宁都城东耶稣教士住过的二层楼房里“设宴”，将留在宁都的那些团长、旅长们都邀请赴宴，将少数反对官兵禁锢，缴下他们的枪支，以他们的名义，调其部队在指定时间、地点集合待命，并亲自在宁都城上写下“解放”二字。起义胜利后，17000余名将士全部加入红军，并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，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。对于宁都起义，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评价：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。

满腔热血染红星

部队经过整编训练，战斗力大大



陆定一：中国革命事业的“老宣传”

□ 杜钰婧

陆定一是我党宣传思想战线杰出的领导人，在党的宣传领域工作近40年，获得了“老宣传”的雅号，是党的历史上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时间最长的人，为党的宣传思想和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他撰写的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》《老山界》等文章入选中小学教材。

“报纸是宣传和组织的一支重要武器”。1906年，陆定一出生于江苏无锡。1918年秋，陆定一进入南洋大学（今上海交通大学）附属中学读书，后成为南洋大学的一名工科生。五卅惨案爆发后，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，《血潮日报》正式创刊，陆定一也参与其中。这份报纸披露了五卅运动的前因后果，公开声明以“记载确实消息及主持公论为目的”，成为上海市学生的喉舌。

1925年冬，陆定一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参与《中国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翻译过列宁的《士兵与土地》等著作，肩负着帮助广大青年群众认清形势、坚定信念、鼓舞斗志的责任。遵义会议后，陆定一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，主编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《红星》报。在人手少、设备简陋的条件下，陆定一一边行军一边担任改稿、写稿、设计版面、印刷等工作。红军在长征经过大凉山途中，需借道彝族聚居地，为消除彝族人民和汉人之间的误解，使红军顺利通过，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诗。这张布告六字一句，朗朗上口，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、任务、政策、纪律，建立起了彝族人民和红军之间的友好关系。

1939年1月，陆定一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《晋察冀边区粉碎敌人进攻中的几个重要经验》，系统总结了晋察冀边区在布置准备、战时动员等方面采取的行动，详细考察了晋察冀的战时宣传工作，为其他根据地反“扫荡”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上的帮助。

陆定一曾提出“报纸是宣传和组织的一支重要武器”，而他的办报实践和编辑工作则充分体现了他的战斗性，发挥了报纸在消灭谣言、鼓舞士气、推进工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为党的革命和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。

“报纸与人民紧密结合”。1942年8月，陆定一出任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相关改版工作。针对在新闻真实性和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的不足，陆定一在改版工作中强调该报更重要的是“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”。他主张实行群众办报，让专业记者与非专业记者（人民群众）相互学习，优势互补。一方面，他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向报纸讲述亲身经历的事实，以此保证宣传事实的真实性；另一方面，他教育专业记者要做人民的公仆，既要虚心请教事实真相的学生，又要做好老师的工作，承担起教导群众学习采访、排版、书写等专业办报技术的责任。

陆定一在改版工作中发现不少记者、通讯员等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学思想的认识存在问题。针对这一情况，他写下了《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》一文，发表在1943年9月1日的《解放日报》上。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实践

中，对新闻的本源、新闻的定义等基本概念做了精辟的说明和界定，指出“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”，确定了“新闻真实性”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根本原则，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。

1946年，为纪念《新华日报》出版8周年，陆定一发表《人民的报纸》一文，进一步明确了“报纸与人民密切结合”的新闻工作基本路线和方针。面对“八年过去了，今后怎么办”的问题，陆定一主张：（一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（二）力求真实，一丝不苟。而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，“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，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，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。”在陆定一的新闻理论和办报思想指导下，《解放日报》加强了和群众之间的联系，报社派副总编辑余光生参加边区党政会议，了解边区的工作情况，并在当地组织出版社论、文章。同时，报社在县、区、乡设通讯员，报道边区的生产、教育等消息，还常用整版大量刊登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。在“全民办报”“全党办报”思想的影响下，以《解放日报》为代表的一批报纸不断增强党性、群众性和战斗性，真正成为“人民大众的报纸”。

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迎来了新的转变，从革命时期的动员、激励人民群众，转向了紧密联系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实际需求。在国内，陆定一从团结党内关系、发展科学文化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宣传工作。为了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旧中国的几百

增强，迅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，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的3万余人骤增至近5万人。同时，起义部队把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带到苏区，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，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。

红五军团成立不久，在赵博生的指挥下，参加了赣州战役、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、建宁等战役战斗，屡建奇功。为表彰赵博生和红五军团的战绩，在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，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赵博生，并授予他“红旗勋章”。就可在1933年1月8日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斗中，赵博生不幸右额中弹牺牲，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，年仅36岁。

为纪念赵博生同志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，1933年8月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建造博生堡，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制作了这块生平碑刻，镶嵌在博生堡的内墙。毛泽东称赵博生是“坚决革命的同志”。叶剑英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，诗云：“宁都霹雳响天晴，赤帜高擎赵博生。虎穴坚持神圣业，几人鲜血染红星。”